

传统忠德及其当代价值辨析

桑东辉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摘 要: 作为传统道德,忠德在其产生之初主要是对人对事的尽心竭力,强调的是忠信、忠恕的待人处事原则。从忠德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看,进入封建社会后,忠德长期被偏狭地作为忠君的代名词。近代道德革命清算的主要是忠君道德这一“负能量”。忠德中的忠于社稷、忠于职守、忠信诚实、忠恕待人等“正能量”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精神高度契合。实现传统忠德当代转换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忠德;道德变迁;当代转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B8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7.04.007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体系中,忠是非常重要的德目,但长期被狭隘地理解为忠君道德。经过近代道德革命、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清算,传统忠君道德被作为桎梏人们的精神枷锁而遭到否定。那么,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中主流道德观念,忠德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其中蕴含着哪些“正能量”和“负能量”?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何借鉴之处?这些都是本文所关注和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忠的含义

从忠的含义看,忠并非通常所说的忠君一义。在忠产生的先秦时期,其原初本义恰恰不是忠君,而是“一种积极的对他人、对事业的态度。忠的基本内容与要求是真心诚意、尽心竭力地对待他人,对待事业”。^{[1](P100)}忠君不过是忠的衍生义。从历代对忠含义的解析看,忠的含义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意蕴。

(一)“中”的意蕴

忠字为上下结构,上部是“中”。《说文解字》曰:“忠,敬也。从心,中声。”事实上,忠字上部的

“中”不仅仅起到声的作用,也对忠字的含义起到重要的指意作用。中则不偏,“中”代表不偏不倚的公平、公正。尚中是中国原始先民的智慧,《周易》尚中思想与忠观念的产生有着内在的关联。^[2]有研究者认为“设‘中’于心就构成‘忠’的意象”。^{[3](P32-38)}这一语道破了忠的尚中价值取向。“中”的价值更生发出公忠的美德伦理,正如《忠经·天地神明章》所云:“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因为“中”有公正无私的意蕴,故而“忠所以分也”,“忠分则均”。^{[4](P41)}而“公”讲的也是分配上的公平。《说文》曰:“公,平分也。”在这点上,忠与公是一致的。此外,忠和公都是相对于私而言的。所谓“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5](P345)}公与私是对立关系。同样,忠与私也是截然对立的。“无私,忠也”。^{[6](P1906)}“以私害公,非忠也”。^{[6](P1845)}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6](P1801)}的公忠观念。此后,“忠,无私也”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在此基础上,更生发出公忠体国的大公无私和爱国精神。

(二)“心”的意蕴

《说文》将忠解释成“敬也,从心”,更重视忠与人的内心诚敬心理之间的联系,表达的是一种由

收稿日期:2017-04-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人伦观的价值合理性及其现代审视研究”(项目编号:13BZX071)

作者简介:桑东辉(196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哲学博士,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衷的、发自内心的诚意。据《国语·晋语八》，春秋时期晋国叔向就说过“忠自中”。韦昭注曰：“自中出也。”忠就是发自内在心意的忠诚。“外内倡和为忠”。^{[6](P2063)}古人对忠字多从心的角度来阐释。《增韵》将忠释为“内尽其心，而不欺也。”《周礼·大司徒》疏亦曰：“中心曰忠。中下从心，谓言出于心，皆有忠实也。”《六书精蕴》以“竭诚”来释忠。这些无疑都是将忠解释成一种对人对事的内心诚敬如一、竭己不欺的态度。宋儒非常注重从心性的角度开显忠的含义。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反复强调：“为他人谋一件事，须尽自家伎俩与他思量，便尽己之心。”“忠，只是实心，直是真实不伪。”“为人谋时，竭尽自己之心，这个便是忠。”“忠，是要尽自家这个心。”这都是对忠德内在心性价值的继承和发展。“‘忠’在理学家设计的道德框架中，大约原本只是一种心性修养的要求，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直接的政治意义。”^{[7](P271)}应该说，忠字的含义最主要的就体现在那种对人对事竭尽己力的心理和态度。

(三)“一”的意蕴

忠德强调“心上只有一个中”的一心不二。《忠经·天地神明章》有言：“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将人心的内在诚敬发展到一而二不二的程度，讲求对人对事的一心一意，反对在待人接物上的三心二意。一是与二相对的，先秦时期阐释忠君观念就一再强调事君要一心一意，有死无贰。《诗经》的“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曾被先秦政治家反复称引。《荀子·致士》也强调“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对忠的“一”价值，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道无二》中曾通过对忠字和患字的比较分析，很形象地指出：“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肯定了忠的一心一意的价值，否定了三心二意的失德之患。实际上，忠强调“一”是从思想到行动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道德要求。但不可否认，扬一抑二开启了后世臣子(包括妇女)“从一而终”的愚忠、愚节先河。

二、关于忠的对象

从忠的对象看，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对人的，一类是对事的。

(一)从对人的角度看，忠的对象可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向上的层面。如传统的忠君、忠主、忠上等都要求在下者要忠于主子，忠于君主。即所谓的“臣事君以忠”。^{[8](P2468)}二是向下的层面。“上思利民，忠也”^{[6](P1749)}无疑是对在上者的道德要求。在上者的忠就是利国利民，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博施广济泛爱众的仁政。三是平等的层面。如先秦儒家所一再强调的“与人忠”^{[8](P2507)}，“言忠信、行笃敬”^{[8](P2517)}，“为人谋而不忠乎”^{[8](P2457)}等等都是体现对一切人一切事的忠。孔子虽然在“臣事君以忠”的层面使用过忠的概念，但他更多的是强调平等主体之间的忠，强调的是人与人平等交往中的忠信和忠恕。忠信观念在先秦时期颇为流行，不仅儒家讲忠信，法家、墨家、道家、兵家、杂家等都讲忠信。忠信是先秦时期的高频词，所谓“忠信相连”^{[9](P101)}。从先秦典籍对忠信的阐释看，最初的忠信二字指向不同，《左传·桓公六年》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但随着时代发展，忠信二字意思逐渐趋同，二者互相补充，互为表里。《国语·晋语二》注重强调“非忠不立，非信不固”的忠信作用。在先秦时期，忠信体现的主要是诚实不欺原则，这种原则广泛应用于家族范畴以外的社会交往中，并成为君子修养的重要内容。《论语·述而》明确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宋儒更将忠与信视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朱子语类》强调：“忠信只是一事……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发。”但二者中忠是最根本的，“信非忠不能，忠则必信也”。此外，儒家还非常重视忠恕观念。孔子更是将忠恕作为其一以贯之之道，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P2518)}，“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8](P2479)}。宋儒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忠恕思想。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明确指出：“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陈淳在《北溪字义》中释忠恕曰：“大概忠恕只是一物……盖存诸中者既忠，发出外来便是恕。”从这些阐述看，无疑忠恕主要是人与人平等主体之间那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交往原则。因此，从以人为主体的角度来看忠的对象，不可否认，封建社会中忠的对象主要指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忠，但在忠德产生之初的先秦社会忠更多的体现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忠。总之，从主体间的地位角度，忠的对象中包含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忠和平等主体之间的忠。换句话说，“在忠德的解读与实践上，大致可分为两种

类型:一是古代政治体制中发展出来的为臣之道——策名委质,致死无二;另一种则是先秦儒家所讲议论说的待人处世之道——诚身明善,从道守义。”^{[10](P246)}

(二)从对事的角度看,忠的对象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社稷和国君的忠。忠是出自孝的。最初的孝道是包含忠的含义的。^{[11](P262-264)}作为没有彻底割断血缘关系而进入到阶级社会的中国,其社会组织为宗法社会,血缘纽带、亲亲原则成为维系人与人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彰显孝道就成了宗法社会的首要道德。在这种家国同构、君父一体的政治—社会结构中,最初的忠无疑是带有孝的色彩,体现的是对家族和家长的忠,继而放大到诸侯国,则是对社稷和国君的忠,再放大到天下,则是对整个江山社稷和周天子的忠。《左传·昭公元年》强调“临患不忘国,忠也。”《国语·晋语四》亦曰:“杀身贳国,忠也。”由于宗法社会的大家长制特点,家长与家族、国君与社稷往往是合一的,因此,对君父的忠实际往往就等同于对家国的忠。抛开对君主个人的忠,对事的忠首先就表现为对社稷和国家的忠。

二是对事业和职事的忠。古人强调“忠于所事”实际上就概括了对事业的忠和对职事的忠。以史官这一职业为例,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敢于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6](P1867)}齐国史官前赴后继坚持将“崔杼弑其君”^{[6](P1984)}载入史册,都是不畏强权、忠于职守的表现。西汉司马迁忍辱负重,继承父亲遗愿写作《史记》也体现了忠于太史令职业操守的可贵精神。按照《忠经》主张,各个职业包括冢宰大臣和农、商、百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守和责任。而忠就是要求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岗位尽职尽责。只有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全副身心投入到各自岗位中,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尽忠”。从这个角度看,《忠经》的《冢臣章》《百工章》《守宰章》《兆人章》等实际是古代的职业道德基本规范。

三是对诺言和谋事的忠。古人特重言行一致,心口如一。早在春秋之初社会就对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忠义行为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和肯定。据《左传·僖公九年》载,晋国荀息在晋献公托孤时曾承诺以忠贞之心辅佐奚齐、卓子。尽管晋献公废长立幼的行为在当时看来是不符合礼制也是愚蠢的决

定,但荀息还是恪守承诺,一心一意辅佐少主,在两位少主相继被杀后,荀息也自杀殉道,不食其言。时人盛赞其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先秦儒家特别重视践诺,孔子强调“言忠信,行笃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逐渐成为中国民间公认的道德操守。其实在先秦时期,对诺言的忠诚最为重视和积极践行的当首推墨家。《吕氏春秋·离俗览·高义》载,墨家巨子孟胜坚持“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率一百八十三人为阳城君守城战死。游侠的那种“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12](P3181)}对忠于承诺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以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逐渐成为中国民间公认的道德操守。对事的忠不仅包括对诺言的践行,更体现在平日的“为人谋忠”上。《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国执政子皮曾想让家臣尹何管理自己的私邑,但子产以尹何太年轻且缺乏管理经验为由劝止子皮。“子皮以为忠”,并将郑国执政位置交给子产。这说明子产“为人谋忠”,是发自内心的,诚如他所说的:“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这种“为人谋忠”的思想被儒家继承发展下去,并越来越凸显其中劝善的“正能量”。如“教人以善谓之忠”^{[13](P2706)}、“以正辅人谓之忠,以邪导人谓之佞”。^{[14](P29)}“为人谋忠”的正义导向极大地凸显了忠德所蕴含的“正能量”。

三、关于忠的变迁

忠德作为一个古老的道德规范,其发展变化揭橥了中国传统道德变迁的历史。当今学界普遍认同,忠字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但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忠观念当早于相关文字的出现。《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国大史克曾追忆,“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这从正反两方面描绘了上古忠德状况。《史记》关于“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12](P393)}和“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12](P3269)}的记载也是后人对先民道德的追忆。尽管这些追忆不一

定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但《周礼·春官·大司乐》中的“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郑玄释中“犹忠也”),说明作为一种道德观念的忠最迟在西周时就已经出现了。而作为一个德目而言,忠德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定型则为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春秋时期忠德表现的还是对象的多元化、义务的双向性,而到了战国时期,忠德变迁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趋势。这个趋势可以概括为对象的单一化、义务的绝对化、地位的至上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原初那种对一切人一切事的双向度忠,逐渐变为臣民对君主的单向度忠,而且这种忠君义务是绝对的,在道德体系中忠德地位不断蹿升,大有超越孝道的趋势。《韩非子·忠孝》强调“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不仅奠定了“三纲”的理论基础,而且在三对关系的顺序上也作了排列,为忠德在汉代超越孝道、贞节观而跃居三德之首埋下了伏笔。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传统的宗法制社会开始解体。由于礼坏乐崩加之孝道已无力调节政治关系,以忠来调节政治、社会关系的吁求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15](P44)}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吁求变得更加强烈。统治者强调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突出专制集权,强化君主独裁和对臣民的绝对领导,以便统一号令,变法图强,一统天下。秦国之所以能横扫六国,一统寰宇,在意识形态和道德建设上凸显忠德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韩非子》《商君书》《吕氏春秋》等都是秦国统一思想、宣传忠君道德的重要理论武器。《韩非子》突出臣子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在《忠孝篇》中他肯定“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而《商君书·画策》关于“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长幼有礼,男女有别”的阐释亦含有三纲的萌芽。《吕氏春秋·孟夏纪·孟夏》凸显“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通过宣扬泛孝论,调和忠孝,以孝扬忠,借助孝来提升忠的地位,使忠迅速成为政治伦理的核心和第一要义。尽管秦国依靠忠德来统一思想和强化君权,但忠德地位至上性的实现并非由秦朝来完成,而恰恰是号称“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初步打牢了忠德至上性的理论根基。

汉是在秦暴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后,汉武帝开始致力于加强中央集

权。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肯定了“王道之三纲”。东汉的《白虎通义》更是明确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统地位,将三纲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两汉以降,强调君为臣纲的忠德一跃而成为最首要的封建社会道德。此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虽然期间国家有分有合,政权有兴有灭,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基本原则没有变,忠君道德的至上性没有被根本动摇。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越是在乱世,就越是彰显忠德。历朝历代统治者采取旌表、赏罚等形式,表彰忠臣孝子,处罚不忠臣子,以鼓励臣子尽忠。尽管忠德作为忠、孝、节三德之首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扬,但实际践履得并不好,特别是南北朝和残唐五代的道德乱象更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赵翼的《陔余丛考》曾云:“六朝忠臣无殉节者。”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死事传》中也慨叹整个五代时期“得全节之士三人而已”,并将五代政权的频繁易主归结为忠德的沦替。宋代在五代离乱后重建统一帝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抬高理学的地位。宋代理学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论证了三纲的神圣性、至上性,将三纲特别是君为臣纲证成万古不变的“天理”,将忠德上升为首要的政治道德。“随着儒家伦理被选择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本身已经取得了作为社会政治生活、法律制度和臣民日常伦理生活与道德行为之普遍指南和规范的社会合法性,由此也成为了支配人们道德生活的主导伦理。”^{[16](P129)}明清统治者继承了宋代加强君主专制的衣钵,将君权发展到极致,同时也将忠德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将封建纲常凝练成朗朗上口的“忠孝节义”四字。宋以后主要就讲忠孝节义了。^{[17](P219)}宋元明清时期忠君道德深深浸润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物极必反,社会上开始出现愚忠、愚孝、愚节等极端化的、非理性的情况。忠德已经成为桎梏人们的精神枷锁,钳制人们的思想工具。

鸦片战争后,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现实使得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变革,并自觉反思中国文化和传统政治制度及道德观念。对三纲这一统治中国两千年的神圣“天理”,也开始质疑、批判。经过近代道德革命,忠德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和清算,

并遭到一致唾弃。

概括地说,忠德出现、定型于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期,随着先秦分封宗法制的解体,强调忠君的忠德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道德,为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服务。而忠德的被批判和被清算则发生在中国历史的又一社会转型期。随着近代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封建帝制的覆灭,强调忠君的忠德最终从纲常伦理的顶峰跌入低谷。忠德的变迁伴随着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又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嬗变。

四、关于忠的当代价值

尽管忠德在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的枷锁和桎梏,但作为传统德目,其除了具有忠君之义,还具有对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和对人的忠信、忠恕等品质。对此,即使是批判三纲最力的近代维新思想家谭嗣同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也都有较为客观的论述。^①更值得注意的是,忠德原初意义中的忠于社稷、忠于职守和忠信、忠恕等超时代、超阶级的“正能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精神有着高度的契合和呼应。传统忠德中的合理内核不仅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源,更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道德基因。

(一)弘扬“忠于社稷”之忠,培育爱国精神

忠德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忠于社稷,即便是在君主专制铁幕下,对社稷的忠也往往高过对君主个人的忠。社稷作为国家和人民的象征,忠于社稷就是利国利民。这种忠于社稷精神就是我们今天爱国主义的源泉。“忠于社稷”不仅表现在国难当头时的以身殉国,更要在和平时时期殚精竭虑,为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福祉而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忠经·报国章》所云“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强调的是为国家建设和人民幸福推荐人才,建言献策,建功立业。在今天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分裂恐怖势力蠢蠢

欲动,国内改革压力加大,经济建设任重道远的情况下,更要求每个人都要拿出忠于社稷的爱国精神,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

(二)弘扬“忠于职守”之忠,培育敬业精神

传统道德始终宣扬忠于职守的职业道德。管仲的改革就是要使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业,各尽其职。在强调职业道德、忠于职守问题上,古人特别重视官员的职业操守。先秦时期就提出:“居之无倦,行之以忠”。^{[8](P2584)}主张“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6](P1801)}对不敬业的官员提出严厉批评,“仕而废其事,罪也”。^{[6](P1995)}东汉王充在《论衡·量知》中更形象地将碌碌无为的官员比喻成尸位素餐,即“空虚无德,餐人之禄,故曰素餐。无道艺之业,不晓政事,默坐朝廷,不能言事,与尸无异,故曰尸位。”明代吕坤在《呻吟语·修身》中强调:“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则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则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则任天下之重。朝夕思虑其事,日夜经纪其务,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于才者求尽吾心,限于势者求满吾分。不愧于君之付托、民之仰望,然后食君之禄,享民之奉,泰然无所歉,反焉无所愧,否则是食浮于功也,君子耻之。”在传统道德语境中,居官尽心尽职乃是忠的表现,所以有人将忠与勤并列,认为勤生于忠,忠自然能勤,忠勤即可尽职。尽管古人大都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角度来谈忠于职守,但如果赋予忠以时代的新内容,忠勤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1](P272)}此外,对于官员,传统道德不仅要求其做到夙兴夜寐的忠勤,还要做到两袖清风的忠廉。“吏不廉平,则治道衰。”^{[18](P263)}治道一衰,就根本谈不上忠于职守。因此,公忠体国、清正廉洁乃是国家公务人员敬业精神的重要标准。要做到忠于职守的敬业,就要忠勤和忠廉兼重,勤政和廉政并举。

(三)弘扬“忠信诚实”之忠,培育诚信精神

按照传统儒家伦理,忠是信之本,信之体;信是忠之用,是将对人的诚心实意落实到实践中的具体行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8](P2458)}“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8](P2463)}都强调的是忠信诚实的普

^①谭嗣同在《仁学》中将忠分为忠君之忠和古义之忠。认为“古之所谓忠,以实之谓忠也。下之事上当以实,上之待下乃不当以实乎?则忠者共辞也,交尽之道也,岂专责之臣下乎?”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也明确提出:“现在一般人民是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国是可不可以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以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

遍人际伦理。这在伦理价值意义上,既是人际关系中每一个体的美德表现,同时也是个体之间相互承诺的责任伦理,即诚实守信的道义要求。^{[16](P107)}这种责任伦理和诚信道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虽然中国传统忠信观是起源于小农经济体制和宗法社会中,与建立在商品经济体制和市民社会中的现代市场经济诚信观有所区别,但在内在道德意识层面对忠信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自觉则是一致的,这是儒家忠信伦理当代转换的基础所在。要将传统忠信价值转换成当代的诚信精神,一方面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将社会的经济关系由重道义的传统熟人关系转化为重责任的市场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在忠信价值的情感因素中增加诚信原则的理性因素,将诚信精神化作人的内在美德和制度的外在制约的完美结合,打通忠信通往诚信的进路。

(四)弘扬“忠恕待人”之忠,培育友善精神

儒家的忠恕之道强调在人际交往中通过伦理角度的换位来体悟他者的感受,从而导出“推己及人”、“以己度人”的宽容恕道。当然,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传统的忠恕之道有其调和阶级矛盾的潜在目的性。如《河南程氏遗书》有言:“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程颐将恕道作为君主待下之道,希望君主对臣民施以宽容和仁慈。但抛开忠恕之道产生的时代背景,仅从人际交往的角度看,这种将心比心、以情度情、换位思考的待人原则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可发挥积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友善,就是植根于“仁爱”和“忠恕”的道德心理,它要求人们能够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其实质是将其余的社会成员当作目的,而不是仅仅当作实现自我利益的手段。^[19]这种忠恕待人的原则对于我们今天丰富发展友善精神是大有裨益的。将传统儒家的忠恕之道进行当代转换,可以更好地在全社会营造宽容理解、守望相助的和谐人际环境。

参 考 文 献

- [1] 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 [2] 桑东辉.《易传》与忠德[N].光明日报,2013—05—20.
- [3] 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一个字的思想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 [4] [东周]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5] [清]王先谦.韩非子集解[A].诸子集成: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 [6]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A].[清]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 [7] 王子今.“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
- [8] [北宋]邢昺.论语注疏[A].[清]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 [9] [清]孙诒让.墨子闲诂[A].诸子集成: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 [10] 戴琰璋.策名委质与诚身明善——概述“忠”德义蕴的演变[A].刘笑敢.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八辑)[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1] 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M].香港: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 [12] [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3] [北宋]孙奭.孟子注疏[A].[清]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 [14] [西汉]桓宽.盐铁论[A].诸子集成: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 [15] 朱汉民.忠孝道德与臣民精神——中国传统臣民文化论析[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16]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7]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18] [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9] 李建华.友善何以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J].伦理学研究,2013,(2).

On Traditional Loyalty Virtue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SANG Dong-hui

(Harb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arbin 150010, China)

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virtue, loyalty at very beginning underlines wholeheartedness, sincerity and benevolence. The virtue was understood narrowly as the synonym of loyalty to the monarch for the long time of feudal society, a " negative energy" which has been eliminated in the recent moral revolutions. On the contrary, the " positive energies" in the virtue, including loyalty to the country, honor of duty, fidelity, honesty and benevolence,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some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like patriotism, dedication, integrity and friendship. Henc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oyalty to the moder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We should take its essence and reject its dross.

Key words: loyalty virtue; moral shift;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责任编辑:石劲松)

(上接第 25 页)

Innovating the Education of Cadres' Ideals & Beliefs with Red Cultural Resources

DENG Yan-ping

(CPC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Nanchang 330003, China)

Abstract: Ideals and beliefs work as the " calcium" for the CPC members' spirits. Since the 18th Congress of the Party, the Central Committee led by comrade Xi Jinping put great emphasis on education of the leaders and cadres in the respects and take firm ideals and beliefs as the first criterion for good cadre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desirable resources for such education. Through ways of experiencing, displaying, participation and simulations, we can use the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effects of the education. Therefore we can strengthen the cadres' affection to the Party and to the people, improve their political quality and their adherence to " four consciousnesses" , and promote their capability of serving the people.

Key word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cadre education; ideals& beliefs

(责任编辑:石劲松)